

# 晚清工业产权制度

WanQing GongYe ChanQuan ZhiDu  
De BianQian

云南人民出版社

## 的变迁

汪戎著

本书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制度理论对经济变迁的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晚清的军事工业企业、官办和官督商办民用工业企业、民有商办工业企业以及铁道企业的产权制度(产权结构和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变迁过程。通过对这些企业的产权主体(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的行为分析,通过对影响产权制度安排的政治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分析,来解释中国工业化初期企业发展及其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冲突和基本道路选择,说明其变迁的历史走向。

# 晚清工业产权制度

WanQing GongYe ChanQuan ZhiDu  
De BianQian

云南人民出版社

## 的变迁

汪戎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工业产权制度的变迁/汪戎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6

ISBN 7 - 222 - 04086 - 2

I. 晚... II. 汪... III. 工业产权 - 经济制度 - 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F42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8259 号

责任编辑: 吴 垠 周 祥

装帧设计: 王睿韬

责任印刷: 刘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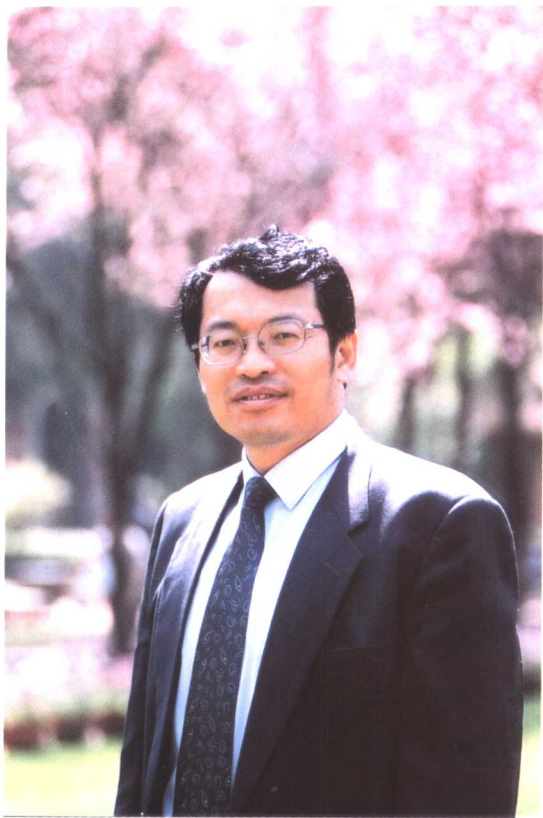
|          |                          |
|----------|--------------------------|
| 书 名      | 晚清工业产权制度的变迁              |
| 作 者      | 汪 戎 著                    |
| 出 版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发 行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 邮 编      | 650034                   |
| 网 址      | ynrm.peoplespace.net     |
| E - mail | rmszbs@public.km.yn.cn   |
| 开 本      | 787×960 1/16             |
| 印 张      | 12.5                     |
| 字 数      | 170 千                    |
| 版 次      |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 - 3000                 |
| 排 版      |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
| 印 刷      |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
| 书 号      | ISBN 7 - 222 - 04086 - 2 |
| 定 价      | 25.00 元                  |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 作者简介

**汪戎** 安徽泾县人,1980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政治理论专业,1986年获云南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史专业硕士学位,1992年至1994年公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进修学习,1996年至1997年公派赴澳大利亚拉托比大学做学术访问讲学,2001年7月获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



自1997年以来,先后出版了《企业经济力的形成与区域性扩展》、《现代管理学原理》等9部专著、合著,在各类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管理学和经济学论文20多篇,主持并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科技部国际合作等10多项科研课题,对现实经济问题和云南经济发展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长期受聘为云南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南省政府宏观经济分析小组成员、云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顾问,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经济顾问等职,对企业运作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相当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

# 前言

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有 140 多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虽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变革，建立了新型的工业化社会，因为中国目前在整体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个漫长的工业化过程已经过去了，但要在整体上实现工业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且我们走得十分艰难，未来还将更加艰难。当我们对工业化的现实深入思考时，深入到工业化与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去探求为什么时，思想就自然而然地回到工业化起步的那些岁月中。

这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时代，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历时 50 年左右。应当说，对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相当宽广和深入了，无论从史料的整理和史程的分析都形成了丰富的、有科学创新意义的成果。然而，过去的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相当部分是立足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注解和历史事件及其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近年来，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对工业化起步过程中的技术变革、组织改造、文化变迁和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资料挖掘和整理，以及更为深入和客观的研究。这些研究利用了其他学科新的学术成果，引进了西方经济学和历史学新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特别是对新制度

经济学的引入和利用，使长期沉闷的中国初期工业化以及整个近代经济史研究又注入了新的生机，产生了新的气象。

这一新的研究现象引起了作者的关注。因为在笔者看来，对社会经济演变和发展影响最为深刻和最为持久的因素都产生于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层面上。经济变迁过程的多样化是经济发展史最具生命力的现象，也是学者们研究最富成果的现象，但同时，多样化的研究却最能揭示出历史发展在具体国家、具体时期和具体区域内的真实的内在规律性。我们用欧洲工业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国工业化过程，也能写出历史，可是我们曾仅仅热衷于“一般规律”的肤浅解释，以致于将活生生的历史都写成了“千篇一律”和“千书一律”。但是当我们将欧洲工业化作为一个具体的特殊过程与中国工业化这一同样具体的特殊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时，就在历史的多样化中恢复了它的真实面貌，从而更加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历史变迁中长期迷惑的现象。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社会经济演进的多样化较少地存在于技术变革、经济流量变化和经济规模增长中，而是深藏在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行为方式中。经济制度的选择和经济行为方式的变革本质性地代表了国家、民族和区域对引发变革的外部冲突的反应程度，以及在变革自身制度和行为时对传统的依赖程度。而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才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演变的历史道路。因而，只有经济制度选择和经济行为方式变革才能解释为什么一国为其一国，而不为他国，这一时期为这一时期而不为其他时期，才能较为真实地再现经济演进的多样性。

事实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过程的解释中，基本上说明了复杂的多样性历史变革和演进的过程。然而，对中国近代社会特殊变化的研究进展，使人们更明白对唯物史观运用的深化和细化的重要意义，更明白人类有价值的思想成就对于认识我们的世界及其历史的共同作用。思想长河是在不断的相互继承和批判、否定和汲取中奔流向前的，利用任何人类思想的优秀成果都是对理论发展的肯定。如果说生产函数理论是对生产力理论的一种深化，那么，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及其企业理论也是

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理论的一种深化。不可否认，深化本身就是批判和扬弃，但同样，深化也是继承和汲取。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产权制度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与西方工业化产权制度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移入和实施也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深化。被西方工业化已经证实了的一般意义上的产权制度演化路径，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又得到了特定的演变和深化，产生出具体的历史意义，它将丰富已有的科学的历史理论，不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也可以丰富唯物史观。产权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微观基础，它更具有难以一般化的不可替代特征，它受制于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因此，世界上也许就发现不了完全同样的产权制度，它具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性和历史性，只有在具体的国度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认识和解释产权制度的形成和运行。

在为学术研究的突破和进展深感兴奋之际，偶尔也发现了某些研究成果的美中不足。(1)有的研究者力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新的史料，以期对经济史事件和人物有更深的挖掘和把握，作出新的结论，但自身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甚少，对其概念和范畴不能准确理解，因而在运用其分析方法时显得生硬，谈不上融会贯通于经济史实的论证中了。(2)对组织变迁的历史在国家制度层面的解释较多，但是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较少，因而没有合理地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性方法，对人们投资、管理、分配、交易等经济行为进行分析。于是，研究成果往往解释不了经济史过程中深层次的现象，特别是对中国最初工业化进程中的种种困难和变化特征的本质性解释又回到了传统理论的定式上，说明不了这一时期中国商人、官僚、地主以及政府的经济决策和行为的多样性及其对产权制度的影响，因而对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演化作不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这两大制约使一些进行了艰苦工作的经济史研究或者不能突破传统的教条，或者不能创造出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因此，本书的研究是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制度理论对经济变

迁的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晚清的军事工业企业、官办和官督商办民用工业企业、民有商办工业企业以及铁道企业的产权制度（产权结构和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变迁过程，通过对这些企业的产权主体（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的行为分析，通过对影响产权制度安排的政治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分析，来解释中国工业化初期企业发展及其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冲突和基本道路选择，说明其变迁的历史走向。

在这里有必要对影响本书的几个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 经济制度的变迁可能是源于外部力量的刺激，但却不能否定一个社会自身的传统经济制度对其变迁过程、途径、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社会在进入 19 世纪 60 年代后，开始了最初的工业化过程。这是一个逐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一过渡过程在西方社会经历了 200 年左右。而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是因受到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刺激，并在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和管理资源的引进和示范下，而逐渐产生的。由于传统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造，新的社会组织力量还没有产生和成长，因此工业化的资源组织和过程安排就由封建政府承担起来了。中国工业化最初的目标是提供国防公共产品，因此，基本的经济单位主要都是军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由政府投资并进行经营管理，它们的产权制度的特征是国有制，企业没有任何现代企业应有的经营自主权。所以从产权制度安排的本质上讲，它们仍是清政府传统军火手工业制度的承续。就是在进入民用工业阶段后，其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也受了清代民间手工业传统制度的影响。所谓“官为维持，商为承办”的行为方式在清代手工业中其实已经产生并长期存在，不过在工业化技术和管理组织中发生了更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和商业以及银行业中盛行的股份制，也不完全是全新引进西方公司制度的结果，而是与中国传统的股份经营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它的所有制度安排和公司治理结构与西方公司都相差很远，因而能为中国的商人、地主、官僚、农民和广大社会阶层所接受。因

此，影响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是民族的和历史的，特别是对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工业产权制度的确立以及对社会制度安排的影响是与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别。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式、途径、方向都绝对不可能进行移植，就是共同受西方工业化影响的落后国家，其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千差万别的。

2. 经济史学不仅要研究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变迁，而且还必须研究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其代表人物的经济行为。更应引起重视的是要研究影响并决定经济行为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将通过对人们经济行为的支配而作用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变迁的途径和方向。中国工业产权制度安排就是在中国特殊的皇权专制和官僚体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下产生和进行的。这一专制政权与社会大众的政治关系，它们与外国列强的关系，皇权与官僚这两个专制体系的关系，都会形成、规范和转化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国产生了进行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军事工业，引发了官僚集团利用国家财政，投资和管理军事工业的企业行为。由于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而使皇权专制与控制经济政治大权的洋务派官僚集团的关系发生变化。在皇权的支持下，私有产权制度在工业领域中较快扩展，商办企业发展较为迅速。传统意识形态对官僚经商的容忍和认可，激励了官僚参与工业化运动，在工业产权制度安排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而新兴商人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内得到皇权认同，也推动了商人与封建官僚的结合，激励了官僚和商人采用各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私有财富的最大化。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工业领域内的私有产权制度得到更快的发展，使官僚、地主和商人们能够在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允许下通过工业生产和经营过程，积累私人财富。因此，在这样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下，他们就形成了 19 世纪 60 年代后特有的经济行为，并不断发生变化，从投资经营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逐渐到兴办商办企业，从而使私有产权在新兴工业领域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这就是对这一时期人们经济行为的解释。如果说解释经济行为的学问就是经

经济学，那么解释人们在历史发展中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史。

3. 历史似乎已经在不断地证明，以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作为存在条件的工业化过程，必然要以私有产权制度安排作为自己的制度基础。但是，私有产权制度安排以什么样的模式、途径在工业领域，以至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这确是有不同的方式和历史选择的。在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国家中，这一实现过程更为复杂和长久，因为专制统治的权利集中需求会产生这样的激励：自发地追求工业化过程的国有产权制度安排。在清末的工业化过程中，尽管私有产权制度在工业领域中扩展很快，但无论是皇权专制统治还是官僚政治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的时期内推动着国有产权制度在工业领域中的不断实现。曾经大力鼓吹商办一切工商企业的盛宣怀，曾经积极推动民间私有产权进入工商企业的清政府，最终都在铁路问题上形成了高度的一致。在清王朝的最后的日子里力主进行铁路的国有化政策，这在事实上是反映了皇权专制政治的本质要求。铁路的国有化政策及其实施，是否预兆了一个产权制度安排选择的历史时代的不可避免，这还需要更多的论证和反思，但是，如果清政府没有因为实施铁路国有化政策而被推翻，为了巩固“君权”，在削弱官僚势力的同时，必然要削弱正在兴起的商人和工业家的势力，全国工商企业全面的国有化也许在20世纪初就在中国强制性地推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假设。

一个国家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决定其选择方向和途径的因素是选择特定产权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包括产权交易的全部行为引致的支出和社会风险）与全部收益的比较。在工业化时代，由于经济发展的不断全球化，产权的交易行为和成本确实受到了工业化技术（规模的和市场的）要求的极大影响，但是一国传统的产权制度安排（包括农业和手工业），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会对人们的产权交易行为产生巨大的作用，改变着社会交易成本和产权收益。同时，产权交易成本的变化又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产权制度安排，迫使社会政治统治秩序和制度安排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种

相互的影响交织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中，决定着企业产权制度选择，构架了特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着社会经济水平和发展质量，并影响了社会经济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书共计八章。第一章是理论阐述，形成全书的理论前提。在这章中，没有系统地论证产权理论的全部内容，而仅仅对产权结构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产权结构关系和产权连续性的分析是对前人零散观点进行系统化的结果。这里，作者把产权特征理论与清代的旗田私有化过程结合起来，对一些现象按自己的理解进行了解释，以图证明产权理论对历史事件和演化过程研究的价值。第二章对清代的手工业产权制度安排展开了研究。这是对传统的认可，这一章的分析力图证明，我们不应当怀疑中国工业产权制度安排不仅是国际性的，而且更是民族性的。这一章初涉了手工业产权分化过程，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产权结构的改变及其引发的各种契约和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动。第三章仍然是为本书的主题进行背景研究。这一章主要是论述西方列强入侵我国造成的民族危机，产生了社会公共产品需要的急剧扩张，以及在西方先进技术刺激和国际市场冲击下，中国的工业生产技术变革和市场组织缓慢的适应性变化，这是中国工业化时代的要求。

从第四章开始，笔者按照历史发展的过程，对中国工业化初期的产权制度安排变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第四章是对第一阶段的主题部分——清政府的军事工业企业产权制度进行分析。与清政府传统的官办军火手工业相比较，军事工业企业的所有制关系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只是随着工业化技术引进和企业规模扩展，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更加多元和复杂了。这一章着重分析了在国有产权垄断制度下，企业委托人行为和代理人行为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体会到，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深藏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中。第五章用较大的篇幅讨论了洋务运动中官办和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产权制度，着重分析了产权结构及其制度特征的历史承续和变迁，对所有制的多元化改造，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多样化形式都作了有个人看法的研

究，这一章对经营者和管理者的个人行为分析较为深入，证明了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产权安排具有特殊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在专制政治制度下获得特殊的发展空间。第六章继续深化了对洋务派官僚所办企业的历史局限所导致的问题、缺陷及其环境分析，指出了对私有产权的强约束产生的产权弱化以及企业委托—代理风险增大的问题，并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对产权交易和产权制度选择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第七章基于甲午战败和戊戌变法的社会环境，分析了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工业领域中私有产权制度的扩展原因和过程，指出了皇权专制与官僚专制的矛盾发展，皇权对私有制产权支持的政治目的，并进一步说明了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在产权制度安排中的作用。第八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论述了应当值得学者们加以关注的晚清铁路国有化政策。在工业产权私有化的历史进程中，曾经积极支持企业产权私有化的清政府，在铁路政策上产生了国有化的转向，它的原因何在？它是否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又有什么历史的昭示？这些都可以从这一变化的史实中去寻找解释。这一章在进行了这样的理论探讨后，认为，这也是某种“路径依赖”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工业化可能选择的一种发展道路，这样的道路是有其制度安排和行为选择的内在要求的。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成稿过程中笔者删减了一些不成熟的研究内容，增加了一些新的资料，修正了一些观点，强化了一些分析，也在每一章的结构上进行了调整。由于在很多方面都是尝试性的研究，其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同时，由于笔者对影响工业产权制度的其他产权制度的研究还欠成熟，因此删除了原博士论文中农业产权制度安排的研究和论证部分，使得本书目前还缺乏从整体社会产权制度变迁的层面去把握工业产权制度的演化过程的内容；又由于笔者对市场组织的分析目前还没有深入到金融市场，对影响工业产权制度变革的股票市场也还没有深入研究的成果；关于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对晚清工业产权制度形成的特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的分析，本书也还是空白，等等。所有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地

深入研究和探讨。因而，本书就其论述的主题而言，还是一部没有完成的研究成果，它的思考仅集中于对晚清工业企业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的自身解释。所以，笔者不是借本书向世人展示什么，而只是为了更有利于向学界同仁们求教，以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探讨。

# 目 录

|    |                                 |    |
|----|---------------------------------|----|
| 1  | <b>第一章 产权制度分析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工具</b>     | 1  |
| 2  | 一、产权结构的基本内容                     | 2  |
| 11 | 二、产权的基本属性                       | 11 |
| 22 | <b>第二章 封建政府强约束下的清代手工业产权制度</b>   | 22 |
| 22 | 一、清代民间手工业的产权制度                  | 22 |
| 31 | 二、清代官府手工业的产权制度                  | 31 |
| 38 | <b>第三章 中国近代工业产权制度供给的历史条件</b>    | 38 |
| 38 | 一、社会公共产品需求的急剧增长                 | 38 |
| 46 | 二、近代工业化的市场组织状态                  | 46 |
| 49 | 三、工业化新技术的供给                     | 49 |
| 55 | <b>第四章 国有独资军事工业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特征</b> | 55 |
| 56 | 一、无经济技术目标的政府委托                  | 56 |
| 65 | 二、缺乏监督控制的代理人行为                  | 65 |
| 72 | 三、产权排他性的变异                      | 72 |
| 76 | <b>第五章 晚清民用企业的产权制度分析</b>        | 76 |
| 76 | 一、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选择                   | 76 |
| 82 | 二、企业产权结构的分化                     | 82 |
| 89 | 三、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                    | 89 |

|     |                                 |  |
|-----|---------------------------------|--|
| 99  | 四、代理官僚个人激励的多元化                  |  |
| 105 | <b>第六章 洋务运动的产权制度改革评价</b>        |  |
| 106 | 一、私有产权的弱化                       |  |
| 111 | 二、企业委托—代理风险增大                   |  |
| 116 | 三、传统意识形态对官员经商行为约束的软化效应          |  |
| 122 | 四、专制的政治制度增大了国有产权私有化过程的交易成本和资源耗费 |  |
| 130 | <b>第七章 私有产权制度选择在工业领域的最初努力</b>   |  |
| 131 | 一、甲午战败与晚清政治格局的变动                |  |
| 140 | 二、产权制度变革深化的先声                   |  |
| 149 | 三、法律、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逐步变迁               |  |
| 160 | <b>第八章 铁路的国有化与产权制度变迁的逆转倾向</b>   |  |
| 160 | 一、晚清铁路产权的多元化过程                  |  |
| 167 | 二、川汉铁路公司产权制度安排及其社会代价分析          |  |
| 172 | 三、晚清政府的“干线国有”政策                 |  |
| 183 | <b>主要参考书目</b>                   |  |
| 187 | <b>后记</b>                       |  |

# 第一章

## 产权制度分析的 主要概念和理论工具

产权 (Property Rights) 最初是罗马法关于规范人们财产占有行为的范畴, 作为经济学的概念, 它也有很久的历史了。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经济学中, 它被用以定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就是使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解释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演变的。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中, 它却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外部性”, 而常常被假设为经济过程已经确定的制度前提。因此, 在很长一段历史中, “产权”概念往往不为“主流”经济学家们关注和讨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随着科斯、阿尔奇安、威廉姆森以及张五常等人对企业制度、交换行为、交易成本、契约关系等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广泛地讨论了产权及其相关问题, 并对“主流”经济学派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于是, 产权及其经济制度约束下的最大化问题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新主题。应该说明的是,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 (Douglass North) 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变迁, 不仅深化了制度经济的理论研究, 而且还扩展了其研究范围, 创新了社会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他完成了《西方社会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两部著作后, 产权制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迅速地成为经济史学家们所运用,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史的研究, 这对于正在制度创新中的中国, 尤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应当说, 产权分析仅仅是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和分析工具之一。本书主要利用了产权结构演化、产权基本规定性和产权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等基本分析方法，试图解释在中国近代特定的产权制度安排下，人们的经济行为、意识取向和社会的制度选择的成因和基本轨迹。因此，本章将适当结合中国经济史的发展个案，对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些经济范畴上的论述作一简单的综合和概述。

## 一、产权结构的基本内容

产权是一个历史性的理论范畴。如果说原始部落最初的公有社会是经济史的逻辑起点，那么在没有任何私人占有和市场交换活动的状态下，“产权”是毫无意义的。人们之间不会存在经济资源的占有、使用、分配等权利的转让和交换行为，无论是人们的习惯规范还是社会的道德准则都不会受这些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约束。如果说“鲁滨孙的世界”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那么在经济资源无任何使用限制和没有市场交换的状态下，“产权”同样无用武之地。因为鲁滨孙不会担心有人会侵占他正在和将要使用的任何经济资源，他可以使用任何他能够使用的经济资源，因此使用经济资源的成本就只是他在使用时所耗费的直接体力和脑力，只有生产成本，而不发生任何交易成本。随着经济资源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产生和市场交易行为的出现，原始的公有社会开始解体，“鲁滨孙的世界”演绎为不同个体的交换市场，财产纠纷和交易冲突必然发生并逐步尖锐起来。于是，为维系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人们通过部落、国家或者社会公共机构开始进行财产归属的界定和交易行为的规范，建立产权制度才成为社会的必需。

应当说，最初的产权概念与它所反映的经济现象同样的简单和抽象。人们所关心的仅仅是财产的所有权，因为“所有权”本身是与财产的使用、让渡、分割等权利融为一体的。而且，因为私人经济规模的狭小，市场交换关系的单一，财产的转让、租借、抵押以及投资行